



国防大学 2 071 0232 0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2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下野返浙点滴	章 培(1)
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	牟龙光(7)
回忆我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	刘万春(29)
蒋介石是怎样搞垮贵州军阀王家烈的?	熊绍韩(45)
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元及外币的经过	詹特芳(53)
宋美龄与遗族学校	储子润(59)
宋美龄—基督教—新生活运动	邓述堃(62)
宋美龄飞迪记	胡彦云(67)
戴季陶为何砸瓶子?	周一志(70)
电话中的宋美龄	王正元(72)
回忆国民党政府对西藏政务的管理	孔庆宗(75)
西藏插手西康大金白利纠纷的真相	孔庆宗(85)
黄慕松入藏纪实	孔庆宗(100)
俄罗斯帝国驻华宗教代表团在华史迹	赵德本(118)
华北护教运动本末记	王孟扬(149)

脱俗琐记	修 明(155)
空门忆旧	仁 喜(163)
故宫博物院盗宝冤案之谜	余 盖(167)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下野返浙点滴

章 培

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指挥徐州战役（当时孙传芳取得张宗昌支持，又卷土重来），结果失利而“下野”，人所周知，但详细经过，却鲜见记述。我曾随北伐军东路军经赣、浙入沪，对蒋介石、白崇禧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当蒋下野后，其侍卫长王世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与我同驻宁绍地区，常有往来；后至一九四三年，王世和参加陆大学习，我适在陆大执教，茶余饭后，常谈及往事。兹就所知，追述于下。

一、白、李、何“逼宫”

徐州战役，蒋介石失利，对北伐军造成损失较大。在南京总司令部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先发言，谓检讨此次徐州战役失利，主因在黔军王天培军不听指挥，贻误戎机，致遭失败，言下不胜悻悻。接着白崇禧发言：“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李宗仁接着表示同意白的意见。何应钦默不发言。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蒋独自在房里踱来踱去，约半小时后，对王世和说：“你打电话请敬之（何应钦）来！”何接电话后赶到，蒋亲切地问他：“敬之，你对白健生（崇禧）的损说以为如何？”何说：“在

当前形势之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言毕，何就返身告辞。蒋深为失望，盛怒之下，命王世和叫警卫师师长姚琮来见他。姚来后，蒋命姚从速集合全师，跟他回浙江。姚说：“我的师已经分散，集合不起来。”蒋更怒不可遏，把姚琮骂走后，又对王世和说：“你赶快集合全团跟我走！”王外出集合队伍，但其中邹公瓚一个营，也听命于何应钦而不愿走。王只剩下两个营，而且搞不到交通工具。蒋无奈，只带一个秘书、两个卫士回奉化老家去了，命王世和率队随后步行赴浙。

据事后王世和告诉我，当时蒋一直认为何应钦与他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而且是黄埔的老帮手，当时只要何与蒋一心，掌握黄埔军还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只要何应钦支持他，事尚可为。

二、周凤岐“逐客”

当时浙江省主席兼二十六军军长周凤岐，本来是跟孙传芳到江西阻挡北伐军的；但在夏超失败之后，他虽回浙，也不容于卢香亭，被逼而投靠白崇禧。在白所指挥的三大战役中，颇能振奋立功，尤其在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他是代替白崇禧屠杀共产党人而回浙江兼任省主席的。

浙江省防军指挥官蒋伯诚，原来是北伐军第一军的参谋长，蒋介石以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是代理第一军军长。

蒋伯诚想带兵，到浙江任省防军指挥官，知道我是夏超部下的统带，就邀我当他的省防军第六团团长，担任宁波、绍兴十四县的治安，这是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的事。

当年八月十日，我接到蒋伯诚急电，要我即刻赴沪，有要事而商。十一日晨抵沪，蒋伯诚见到我就说：“你来得很好，但有人说你倒向白崇禧了。总司令回奉化，想不到周凤岐这个坏蛋，派了一个秘书，带五万元送总司令，且要他赶快离浙，以免他办

事为难。总司令气极，命我派兵扼守钱塘江，本月十五日起，将浙东税收，一律截留充饷，并给我三百黄埔学生，要我组军守江。我在宁绍只有你这一团主力，你看怎么办？”我说：“我团是驻防部队，分驻十四县，有固定任务，充其量只能集结一个营。周凤岐有一个军，以一个营守钱塘江沿岸，以御一个军的进攻，无异暴虎冯河，我是不干的，难道区区一个周凤岐，您就没有办法了吗？”蒋伯诚问计，我说：“您去见何应钦，就说总司令本是第一军军长，现在下野回老家都不行，您、我当代军长、参谋长的颜面何在？您此去一方面向他汇报总司令回浙的实际情况，顺便摸摸底，到底周凤岐这一手是自己搞的，还是另有渊源？”

蒋伯诚一听言之有理，当夜赶赴南京，见了何应钦，何说：“周凤岐是白健生安排在浙江的，应请健生来解决。”当即电话告白崇禧。白到，听了蒋伯诚的汇报，大骂周凤岐胡闹。最后决定将周凤岐撤职，以总司令部参谋处长陈卓报二十六军军长；由何应钦兼任浙江省主席，而以浙江省防军指挥官蒋伯诚兼代。

蒋伯诚这下来了个两而光，自己也捞到个代理省主席，好不高兴。回沪后真有点忘形，连称我是他的“诸葛亮”，即命我偕他赴宁波。抵甬，立即以省主席名义召集开会，到会的有宁波警察局长蒋鼎文、我和我团第一营营长蒋伯雄。会议决定：命蒋伯雄率所部到奉化严密警戒，保护总司令安全，并要我代表他每周去伺候总司令一次。我当时考虑到团里有不少共产党人，我三弟秋阳化名章乃起任团军需主任，我害怕经常离开会出意外；另一方面我也有自知之明，这位总司令我是难伺候的，我是干不好也干不了。我沉思了一命，正拟托词，蒋鼎文插进来说：“章团长负担十四县治安，责任不轻，恐难离开；我只要蒋局事托交张剑吾督察长兼代，可以专心去伺候总司令了。”我闻之，乐得顺本报舟，这个差事，就让他去顶了。

三、侍卫队抢劫余姚银行

过几天，王世和带两营侍卫队步行到达百官^①，状况十分狼狈，大有“草木皆兵”之势。王到团部和我商量，要求暂住团部，以避白崇禧的追击，并知我与白是保定军校三期同学，要我照拂一下。我因上述种种原因，不愿意他驻在我团部或附近。我说：“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我扼守曹娥江，保护你的部队乘火车到宁波，保护总司令。否则，你怎么称是侍卫长呢？又侍卫谁呢？”他一听，正合他心意。他是怕我不让他走，故意这样探探我的口气的。当即给他们吃过饭，联系好火车，上路。谁知车过余姚时，就有两个连一定要下车，将余姚中国银行劫掠一空，带枪拉上四明山当土匪去了。原来这两连中多数人本来就是四明山土匪出身，真所谓兵匪一家了。我曾为此电告蒋伯诚，他回电要我严守秘密，以免有碍听闻。他另派人去处理银行被劫事，而这两连人仍入山为匪，在治安上给我增添不少困难。

不久，蒋介石赴日本，王世和借总司令部侍卫长名义，在宁波简直闹得像个土皇帝，娶了军装店的女儿陈像玉做老婆。结婚之日，门前张灯结彩，真是车水马龙，贺客盈门。我当然也是贺客之一。后来，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宁波同乡，群起告了王世和一状。结果王被蒋介石拳打足踢，揍了一顿，以平众愤。

四、绍兴遭池鱼之殃

蒋介石下野这幕丑剧，是国民党内部倾轧、矛盾的结果。但是，蒋介石早就有意改变第一军为浙江籍，以便作为他个人的本钱。所以在浙江搞了十个总司令部的补充团。其补充第二团及第

^① 百官，镇名。在浙江省东北部、曹娥江沿岸、萧甬铁路线上。

六团，就在我的辖区：第二补充团驻五夫营房，团长萧健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的，知道蒋介石下野后，整个团就自动解散了。第六补充团驻绍兴城内，团长刘保定，黄埔一期毕业，他到绍兴不久，就娶了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的女儿，知蒋下野后，以军饷无着为名，向绍兴商会借到十万元，带着新婚的老婆走了。其部下的营连长，也要了五万元，并缴了绍兴县公安局七百支枪，但缺乏子弹，知道我团子弹很多，只有一个特务连在身边，决定要来偷袭。幸而绍兴人对我有好感，设法利用铁路的电话，报告我团。我侦知情况确实后，即对团部及分驻在嵊县、新昌、上虞三县官兵作紧急部署，并电告蒋伯诚。蒋伯诚也认识到绍兴人是不可侮的，即回电要我对叛兵格杀勿论。当叛兵进袭百官我团部时，被我迎头痛击后，即向嵊、新、上三县逃窜，被我团先后缴枪七百余支，俘人近一千，只在曹娥江畔毙了两个持枪抢劫的士兵。在三界捉到一名黄埔四期生，他持手枪抢劫商铺，被逮住以后，我团中校团附杨步飞，系黄埔一期毕业，要求保释，因三界系三县交界地区，司法权在三县，经三县会审后，结果仍被枪决了事。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仅在我所知的宁绍地区，其扰民害民，殃及人民群众的事件，即有上述之多。

五、替死鬼王天培

北伐军自从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实已失去其所谓国民革命军固有的本质。嗣后徐州之役，实质上也就是新旧军阀之战。蒋为了推卸失利的责任，嫁祸于王天培。

何应钦在贵州与王天培同时当旅长，向来不和，到一九二〇年何被逐出贵州，王天培也是逐何的干将，现在何应钦既是南京军事委员会三巨头之一，又兼浙江省主席，王天培的命运就很危险了。

我团少校团附童厥初，原任浙江省防军副官处科长，他诚是

奉命去执行王天培死刑的见证人。据童告诉我：王天培解职后，原来是要他到杭州西湖休养，接着何应钦就派专人送来军委要枪决王天培的命令。王天培很迷信，临刑还拿出一颗保命的“舍利子”（佛骨）。

何应钦此举既报了私仇，又可讨好蒋介石，为以后共事留余地。

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

——我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活动的回忆

牟 龙 光

前 言

一九二九年春，我在中央军校第六期将毕业时，曾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派。不久，我由中央军校毕业。适蒋介石令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在卫戍司令部设立“政治警察训练班”，延请德国顾问闻德、克勒托拿等人为蒋训练政治特务。蒋介石当时是军校校长，他来点名时，在我的名字头上划了一个红圈，指定我报考该训练班受训。与我一道入该班的计六十多人，都是军校六期毕业的学生。改组派当时也希望我进入这个班，将来在蒋的政治特务中作特务中的特务（以后这个班的许多人都进入了军统）。我入该班后约两月，军校放了暑假，这时由于政组派在军校的领导人、军事教官罗翹秀粗心大意，疏于检点，政使加入改组派的军校同学六十多人的名册被一个江西同学盗走向蒋介石告密。组织泄露了，我于同年八月初逃出该班，与三十多名参加改组派的同学相约赴沪，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三百一十四号报到。报到后由朱霁青委员指定焦斐瞻安排我们的食宿，住在马浪路京都公寓，由政组派组织负责我们的生活费用。以后曾在上海、香港、广西梧州、江苏、贵州东部、北京、太原等地作过反蒋军事活动。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与汪精卫的改组派之间的斗争，是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市场的角斗的一个反映。与此相配合，国民党

新军阀之间也爆发了一系列争夺地盘的战争。总计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的三年间，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即有六七次之多，战祸遍及大半个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也使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现将我所了解的这一时期蒋、汪矛盾的一个侧面分述如下，由于事隔半个多世纪，挂一漏万或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乞读者不吝指教。

一、我加入改组派的时代背景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创建由共产党参加领导的黄埔军官学校，组织国民革命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旬从广东出师北伐，以雷霆万钧之力，相继击溃了盘踞于长江沿岸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主力，挫败了号称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实力。全国人民咸以为中国将由分裂转化为统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付诸实现，全国各界青年纷纷奔赴广州、武汉、南京，投入革命阵营者数以万计。我个人也是投入这股革命洪流中的一员——一九二五年，我离开贵州，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但是，正当革命势力迅速向长江、黄河流域发展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积极准备破坏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五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长沙、武汉等地，无数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惨遭新军阀的血腥屠杀。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曾一度辞职赴沪，以威迫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员赴南京。九月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宁汉两派合流。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复任总司令，翌年一月通电复职。蒋重新上台后，处

心积虑地把政治、经济、军事和党务大权抓在自己及亲信手中。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紧张策划，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决定于一九二九年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施政方针”，使其攫取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用指派、圈定的办法，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把在广东召开的第二届委员会选出的执行监察委员，即所谓“粤方委员”，包括许多头面人物，诸如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王法勤、朱霁青等人，一概排除在外。当时在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这些做法，持反对态度者，为数是不不少的。

这时，汪精卫在法国；在国内的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王法勤、朱霁青以及相当一部分“粤方委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主张，遂在上海组成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下设行动部、地方干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宣传部等，并在上海办有一个刊物，名《革命评论》。在刊物上，主要是为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人出席三大制造舆论。记得大意是汪、陈、顾等粤方委员，是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当然代表；而“西山会议派”为邹鲁、谢持、林森、居正、张继、李石曾、胡汉民等，则是反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出党了的，故不能出席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次，刊物还就“中国国民党代表的是什么”组织讨论。内容是：一个政党应有它的阶级基础，没有阶级基础，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建筑，是立不稳的。那么，国民党代表的是什么呢？有的主张代表全民的利益。全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以及士大夫阶层，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国民革命最终目的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当然赞成以上两个口号，地主、资产阶级、士大夫阶层是不会赞成这两个口号的。因此国民党代表的应该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较为切合实际。有了这样的阶级基础，才能团结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推翻封建政权，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传我之民

族，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三民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先建立民治、民有、民享的新国家，进一步走到共治、共有、共享的大同社会。那时，我们大多数青年对马列主义还全然无知，不知道由什么具体的道路走向大同社会，误以为孙先生的大同思想，通过国民革命就可逐步走到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我们仅凭一知半解的感性认识，认为改组国民党，反对蒋介石对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包办独裁就是革命。这在军校的六、七两期同学中，曾成为最尖锐的争论问题。很多同学都赞成国民党只能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论点。看到蒋介石把“西山会议派”拉进来，以及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都不约而同地要另找出路。

当时改组派在江苏主要分布在南京和镇江。当然，在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南宁等较大的城市，也秘密设立了地方干部委员会，开始秘密地在普通党部和军队特别党部吸收成员。中央军校六、七两期及军官研究班的许多同学，就是在军校特别党部里秘密吸收的。我个人也是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参加改组派的。

二、参加改组派的经过及活动

在中央军校里有个战本教官罗翹秀，江西人，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曾在广东作过军校入伍生的大队长，军校迁到南京后改作战术教官。他肯于与学生接近，战术课也教得不错，得到了学生的信仰。罗对蒋介石的领导是不满的。他在广东时，曾认识汪精卫、朱霁青。故由朱指定他作军校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有一天他约我和余奇（湖北人）去南京骂驾桥他家里去谈话。我们去了以后刚坐下，他就拿出《革命评论》给我们看，接着问我们觉得怎样？我们说改组国民党，反对蒋介石独裁，我们是赞成的。不一会儿，炮科同学阮略、闵剑梅，步科同学陈鼎新、吴昌中都

来了，他们也赞成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主张改组国民党。当天，我们几个人都填了表，举行了参加改组派的手续，这是中央军校第一批改组派成员。以后陆续在中央军校六、七两期和军官研究班、要塞炮兵班发展了一批成员。现在记得起来的有贵州人彭季良、阮略、张体泉、陈天化，四川人闵剑梅、蒋公理、唐炯，湖北人张书麟、何奇、余奇、喻乃智，湖南人谢一中、袁昌勋、刘刚、宋铁英、陈鼎新、谢成章、陈陶、谷一心，江苏人贺天祥，浙江人汤涛、陈悟生、盛进修，安徽人詹冲；此外，还有四期同学四川人赵惠谟、夏署中，湖北人黄天煜，河南人李定，湖南人罗北海、王前富；第一期同学有潘学吟、李其中；在镇江发展的有滕固、卢印泉、罗青、邓飞黄、谷署吟、李向荣等。这些人都有能力，善写作，也有一定的干劲。

我们参加改组派以后，分为若干组，每周过一次组织生活，围绕着当时的形势，讨论如何在党务、政治和军事部门宣传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意义和欢迎汪、陈、顾等“粤方委员”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驱逐“西山会议派”出党，掀起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政的护党救国运动。

记得四月初在南京市党部召开一次党员大会，反对蒋介石指派圈定代表，欢迎汪、陈、顾等“粤方委员”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先，我们把军队特别党部的改组派成员的党证转移到市党部去，以备参加这次党员大会。在大会开始时，我们有意把当时党务学校（以后改为中央政治大学）的教务主任谷正纲选为临时主席。会议开始，临时主席谷正纲正在宣布开会意义，就被蒋介石事先布置好的特务、警察、宪兵拉下临时主席台，一阵拳打脚踢，谷也挨了一顿打。大会虽然不欢而散，没有什么结果，但是闹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群起反对蒋介石独裁、横暴的行为。顽固腐朽的国民党更加不得人心，“西山会议派”一个个重新回到国民党中央镇导机关，分掌党政大权，政使国民党更加腐朽。蒋介石等少数军阀和改组派的斗争更趋激烈。谷正纲于被打

之后的当晚奔赴上海，正式投入了改组派的怀抱，成了汪精卫集团的心腹干将。谷以后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社会部长，一直做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有人说都是与挨这一顿打有关系的。

三、组织被破坏被迫逃亡上海

参加改组派，在当时人们称为国民党的左派，几个月的时间，中央军校六、七两期的学生已有五六十人，但是，由于当时军校的领导人罗翹秀倚老卖老，自恃在军校资历长，与军校教育长何应钦、教授部主任王柏龄、训练部主任王右于（后为张治中）是老同学，不会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阴谋，因而疏于戒备，保管改组派成员的登记表和自传漫不经心，而是乱丢在抽屉和帐顶上，用几张报纸一盖了事。其时有一个江西同学想追求他的姨妹，他不赞成，这个同学就盗走了六十多人改组派成员的名册和登记表去向蒋介石告密。幸而这时中央军校正放了暑假，有些同学回了家，学校当局想到开学时再一网打尽。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互相通知，准备离开南京去上海。惟少数同学如张书麟等因家庭通讯地址不详，无法通知，以致被捕，与改组派领导人罗翹秀一起关进陆军监狱。

这时要塞炮兵班正在武汉附近的要塞实习，我通知了彭季良，彭又通知了谷一心、汤情澜，他们都离开炮兵班到上海集中。有几位同学已分开到张发奎部和唐生智部，张、唐都同汪精卫较好，这两部算是改组派的基本实力部队。结果这些被通缉的人，不仅未被逮捕，反而得到重用。

我和余奇正是在“政治警察班”学习，知道组织被破的消息较早，但考虑到如离开恐会走漏消息，学校就会紧急下令逮捕其他未得消息的人，故仍暂时留在班上，只是随时观察班内是否对我们采取行动。

卫戍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王前富是改组派成员，他的名字不

在我们的名单上，如卫戍司令部下令捉我们，一定要政治部同参谋处一道来，少校参谋余辉庭与我有交情，若有逮捕我的消息，他也会事先通知我，王前富也会设法让我们离开，因为我们已同他们打了招呼。我们感到这样相当稳妥，不会贻误事机。我个人又多准备了一招，先请朋友写了一封假信，说我大哥病在徐州，要我前去探望，故向班里请了假，还借了二十元的旅费，同时将行李除书籍外，均拿了出来，在下关找个小旅社藏起来，但仍保持与王前富的暗中联系，直到军校暑假期满的当天，先后在下关集合了三十多个同学一道乘火车到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三百一十四号报到，算是逃出了南京这个虎口。报到后，朱霁青委员从他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把正在看着的《社会科学大纲》放在会客室的桌上，捋着他的长胡子问了我们的名字，然后说：“南京昨天有信来告诉我，知道你们今天要来。蒋介石首先背叛了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把‘西山会议派’都拉回朱了，以后还革什么命？他还通缉你们，我们把党改组了，打倒他的独裁政权问题就解决了，通缉也就无用了。我们是在护党救国，救国家民族，不是为个人或为哪些人的利益，而是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国家的财富是这些人创造的。但他们又是被剥削者。”随即叫焦斐瞻来同我们见面，并由焦带我们到马浪路京都公寓和大华公寓住下来，食宿和生活费用，都由组织负责开支。我们住定后，起初没有事做，只是吃完饭逛马路。过了几天又到法大马路（号数忘记）王乐平委员办公的地方去研究今后到什么地方去工作。王乐平是山东济南人，身躯高大，对人态度和葛，又很健谈。他先问我们想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说：“听党分配。”他接着说，我们最缺少的是革命武力，你们三十多个同学，每人只掌握一连人，就可以编一个师，每人掌握一营，就可编一个军，至于掌握一旅、一团，那就大得多了。今后我们的基本力量，就靠你们。目前张发奎部由宜昌起义向广东前进，待到广州攻下，局势安定些，你们就可以到那里去。唐生智刚去白崇禧的四集团军

接总司令职，部队还不稳，现在还不能到那里去。

大约一月的光景，我们又到王乐平处去组织黄埔同学会，由刚从日本回国的一期同学潘学吟召集，四期同学赵惠谟、李定、夏暑中、五期同学赵麟祥作筹备委员。这个同学会与南京的黄埔同学会是对立的，南京的是拥蒋的，上海的是反蒋拥汪的。

王乐平是行动部长，一切反蒋的政治、军事行动都是他负责部署和指挥。所以到他那里，我才找到谷正纲、卢印泉、罗青、赵惠谟，他们在《革命评论》、《上海晚报》、《革命晚报》等刊物上，几乎每天都发表文章。赵惠谟是负责联络的，经常到我们的住处京都公寓、大华公寓来问我们的生活情况。

到了九月中旬，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从六月在宜昌起义后，经湖南向广东前进，到达广州附近。这时我们就从上海乘俄罗斯皇后号都船到香港去找陈公博。陈当时负责政组派在广东、广西等地的指导工作。到香港之后，陈指派梅哲之安置我们的生活，在旅社里住了两夜，就迁到九龙城现租的三间房子里住下来，每人给我们买了一张帆布床，住起很舒服。临时给我们雇了个烧饭的，伙食搞得很好，有火腿、炒沙河粉等菜。陈公博还亲来看过我们，与我们谈话态度和蔼，一面谈，一面抽他的吕宋烟斗。他说：“汪先生不久就会回来，有他来主持中央，革命才有办法。蒋介石是新军阀，一个军阀，怎能谈得上革命呢？他还不如‘西山会议派’的那些人，他确没有半点革命思想，对三民主义一窍不通。我们非打倒他不可，否则就不能护党救国。”他还要我们住几天，等张发奎部攻下广州，就到张发奎那里去。又说蒋介石不得人心，冯玉祥、阎锡山、俞作柏也都通电反对他，他的命运是不会长久的，现在不过是在垂死挣扎。

四、梧州下狱

张发奎政击广州受挫，通到江西边境，联系白崇禧部由广西